

牢记使命 把信仰擦亮——访歌曲《信仰》曲作者孟文豪

■ 郭超

歌词是文学吗?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好的歌词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但歌词又不同于一般的诗歌,它是需要配乐演唱的。对此,作曲家孟文豪深有体会。

他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听歌时比较虔诚。把磁带买回来,一边放歌,一边打开磁带盒里的歌单,看着歌词学习哼唱。现在,人们听歌都不怎么看歌词了。如果歌词比较拗口,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那可能直接就不听了。这就是歌词和一般诗歌的一个重大差别。你不可能指望听众拿着歌单仔细琢磨你歌词背后的深意。

《信仰》这首歌就好好在简单易懂。“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孟文豪说,第一句就很简洁,而且还有一定的诗意。每个人都有梦想,也会有兴趣听听这首歌是怎么说的。“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不忘初心放飞理想和希望,牢记使命把信仰擦亮。同心协力追赶奋进的时光,汗水与担当写出出彩的华章。”歌词把我们熟悉的口号转化为富有诗意的语言,唱出来朗朗上口,声声入耳。

孟文豪说,这首歌在旋律上比较有特点,第一句从第二拍起,打破了平常的节奏,听起来更加昂扬。编曲将管弦乐器和流行音乐元素结合起来,电吉他用得比较多,还用了大号、小军鼓、民族大鼓,整体上让人很振奋。

歌手平安和喻越越的演唱充分诠释了歌曲的魅力。孟文豪说,这首歌在录制MV时也十分下功夫。他们先后在深圳、上海、北京三地取景录制,通过画面展现了改革前沿的面貌、党的诞生地的风采和首都的文化底蕴。

(据《光明日报》)

“网红图书馆”不仅有颜值更有内涵

■ 方童

岁末年初,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又火了一把。这家被网民推上热搜的“网红图书馆”启动内涵提升计划,希望通过内涵而不仅仅是独特的造型,吸引更多群众走进图书馆。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在软硬件上做好了功课,涌现出不少的“网红图书馆”,而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更是成为各地图书馆争相效仿的样板。据了解,开运营仅仅一年多,滨海新区图书馆火得一塌糊涂,吸引读者和参观者超过255万人次。“世界上最酷的图书馆”“每个爱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好评如潮,不少读者在这里享受阅读的快乐,也有不少专程来看建筑。

那么,滨海新区图书馆到底拥有哪些让人眼球的魅力?“炫酷”“科幻”“颜值高”,在众多的溢美之词中,读者更看重在阅读中寻求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统一。2017年10月开馆的滨海新区图书馆,由荷兰MVRDV建筑设计事务所与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及其他专项团队共同设计完成,共6层,建筑面积3.37万平方米,主体高度29.6米,设计藏书量120万册。人们一走进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开馆以来,已接待130余家国内外媒体。

在这个看重颜值的年代,一张好看的脸的确能起到蝴蝶效应,引来人们趋之若鹜,但仅仅只有颜值万万不够。滨海新区图书馆馆长张会凤在解读“网红”二字时说,“能把人留住的是还是内涵。”从报告厅的“天眼”设计,到分布于图书馆各个空间的120万册藏书,这种由外及里,从外表到内涵散发出的文化魅力让人叹服。

文化的传播有着动静结合的特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扇窗口,图书馆要将自己的属性发挥到最大化,向受众传递更宏亮的文化之音,需要牢牢抓住读者的所需所求。从文化服务的多元化到亲民性,再到审美视觉上的开放性,图书馆应该成为颜值和内涵并存的读者的钟情者。不管是图书馆,还是分散于城市和乡村的书店、农家书屋,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客厅敞亮起来,让读者尽享文化之美。



更多精彩内容
下载无限乐山

一张38年前的彩色老照片《农妇与村童》

■ 宋道君



《农妇与村童》

布鲁诺·巴贝 1980年摄于乐山大佛脚下



38年过去了,杜江波(照片中的村童)还记得当年为他拍照的外国人。 宋道君 摄

一个外国人留下的“乐山影像”

摄影作品《农妇与村童》,记录的是一个农妇与一个村童在三江汇流的河边吃饭的场景,呈现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画面中,杂草丛生的河边乱石裸露,农妇身系一张围腰,而村童衣着不整,一脸无助。背景则是滔滔的三江水,千年大佛巍然屹立,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这幅图片现存于世界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图库中,由著名摄影师布鲁诺·巴贝于1980年在乐山大佛脚下拍摄。

巴贝,1941年出生在摩洛哥的法国人。20世纪60年代,他加入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1978年至1979

年任马格南图片社欧洲区副主席,1992年至1995年任图片社全球主席,2016当选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士。巴贝的作品以对色彩自如且协调地运用而闻名于世,他的足迹遍及五大洲,见证了无数次历史事件,是闻名世界的摄影大师。

1973年,巴贝随法国总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1980年,巴贝第二次来到中国,花了一个月时间在上海、四川和广西拍摄,使用的是以色列浓郁而著称的柯达克罗姆反转片,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留下了大量历史影像。

巴贝1980年的四川之行,用柯

达克罗姆胶片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乐山绚丽多彩的图片影像。在巴贝的镜头下,既有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也有乐山乡村生活场景。以乐山大佛为背景在乐山大佛脚下拍摄的《农妇与村童》,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乐山的珍贵图片之一。

1980年,中国城镇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尤其农民的生活还比较贫困。当时物资相当贫乏,人们吃饭要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9至1980年我国农村年纯收入人均60-70元。就拿四川乐山大佛坝村来说,当年农村年纯收入也不过60-70元而已。

寻找《农妇与村童》原型

2018年10月14日,虽说不理想,但笔者与影友刘跃平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乘船去市中区篦子街大佛坝村六组,寻找当年巴贝镜头里《农妇与村童》的人物原型。在乘船途中,看着滔滔的大渡河,大家感觉很茫然,心想怎么寻找呀,这就像在大渡河捞针一样。我们拿着手机中存留的图片《农妇与村童》多方打听,当地村民争相传看,大多数人摇头说不认识。正当我们失望时,忽然,一个当年在铁牛门撑船的村民杜建林在仔细察看照片后说:“我知道,我认识,老人是黄秀珍,是我们大佛坝村的人。她家沾了改革开放的光,现在过上了丰

衣足食的好日子,不过老人几年前去世了。而图片上的小男孩则是大佛坝村杜高海的儿子,叫杜江波,现在40多岁了。”经多方打听,我们找到了杜江波家。杜江波的父亲杜高海告诉我们,杜江波1974年12月7日出生,现在在外做铝合金门窗生意。老人热情地打电话叫儿子回来,我们在他家等了30多分钟后,杜江波回来了。

杜江波的模样看上去与38年前巴贝镜头下的村童区别不大,十分腼腆,但眉宇间有着一份淡定和满足。因为天气不好,能见度极差,我们与杜江波聊了一个小时就返回了。

11月8日,阳光灿烂,我们再次

来到大佛坝村找到杜江波,想趁大好天气在巴贝曾经的取景之地给杜江波拍一张照片。但是,由于三江流域水量充沛,河滩水位升高,我们无法走到当年巴贝的拍摄地,还原《农妇与村童》的场景。在交谈中,我们得知杜江波一家有四口人,他和妻子及两个儿子。妻子在家带小孩,大的儿子17岁,小的儿子不到两岁。杜江波做铝合金门窗生意,一家人在城里生活,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农妇与村童》,一张38年前的老照片,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乐山发生的巨变,也使我们对乐山的发展满怀憧憬和期待。

《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连载

袁昌英:上得讲堂,下得厨房(一)

■ 张在军

间居室,紧挨堂屋的一间是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后面一小间用作盥洗兼马桶间,堆放箱笼杂物,朝西的一间狭长的房,塞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两张书桌,一个五屉柜,是母亲、弟弟和我的栖身之所。”

搬进让庐的三年,是袁昌英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期。那三年,袁昌英的生活节奏,可以概括为一个“忙”字。“忙!像我这么一个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么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又是个母亲……又是个教授,而且自命是个挺认真的教授……可是,我这个不守本分的人,还有一个毛病……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作文章。”1943年四五月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邀请袁昌英编著《法国文学》一书,十万字左右,约定当年十月底交稿。于是,“从七月五日开始工作,在整个将近三个月的暑假里,我苦作的像个黑奴。因为屋小人多,我把书籍笔砚,搬到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兼便房的屋子里,实行埋头苦干。天气有时热到九十七八度,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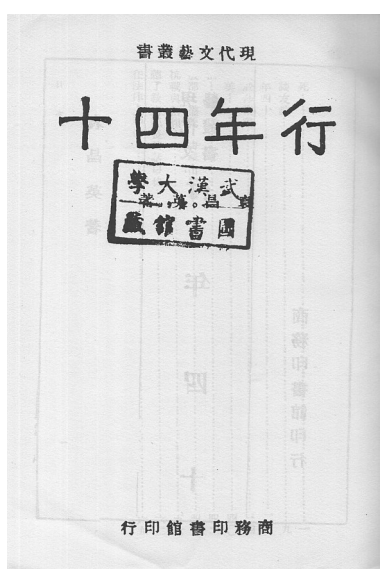
流浹背,我也不管。小孩哭叫,我也不管。柴米油盐,我也不管。应酬交际,我也不管。什么也不管!其实我又何尝能够完全不管!只是管那万不得已的而已。”

一个夏天写了十万字,仍未写完,开学后要教一门新课,非编讲义不可,所以,“美丽的《法国文学》,还缺着三只脚儿没有绣完!”于是一拖拖到1944年元旦。

不管做什么,袁昌英心里无时无刻不揣着国家、民族。这意识已溶解流淌在她的血液中。她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亲自参加和引导女生为抗日将领马占山积极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抗战开始了,袁昌英异常振奋,她主动把自己多年积蓄,很大的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援抗日。1940年1月,她在散文《生死》中热情歌颂前方战士英勇杀敌,“我们现在前方作战的青年在那爱同胞、爱国家、爱民族的狂热情绪中过日子,虽然也许短暂得只有一年半载,却比在后方那些花天酒地专为私人利益经营地位的行尸走肉比较起来实在是更有生与死、存与亡的天壤之

别。”抗战后期,大后方上上下下一片腐败,袁昌英忧国忧民,痛心疾首。1944年她对即将毕业的外文系学生语重心长地说:“今后走向社会,要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都要牢记武大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在繁重的课务兼家务之余,袁昌英争分夺秒抽时间写作,除了出版专著《法国文学》,写了五幕抗战剧《饮马长城窟》,还把发表的一些散文游记等,结集为《行年四十》由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出版。杨静远曾概括她母亲在乐山那几年,“年近百半的她像开足了发条,真有点拼命三郎的意味。她矮小单薄的身躯里,像包藏着使不完的劲。”这现象,她在《行年四十》一文里,从哲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或者说,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四十岁是人生的一大关卡、险区。因为,“在四十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生活大半是被那个创造生命的盲目意识支配着,实在可以说在‘替天行道’!”“四十岁以上的人,



袁昌英《行年四十》书影

资料图片

经过生命力最后打挣扎的战争,而得到平衡以后,他的心境就如‘一泓秋水’,明静澄澈……因为心境的平衡,他的判断力就来得比以前特别清晰。一生有意识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事业心特别浓厚;立德立功立言三种大人物都要求在这时候特逞身手,做出他或她性灵中所要求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有刚过四十岁的人,就自称衰老,遽尔颓丧,那就未免太过自暴自弃了,因为他的一生事业,这时才真正开始咧!”

(未完待续)



苏雪林当初能进武汉大学任教,与袁昌英的极力宣扬有很大关系。袁昌英能住进陕西街让庐,则与苏雪林的邀请有极大关系。苏雪林在晚年回忆中说:“我的朋友袁昌英一家自乐山第一次大轰炸,举屋被毁,另一家即韦从序教授,那次轰炸也被灾,都移居乡下,入城上课十分不便。现敌机轰炸既稀,他们都想搬来城中,让庐上下共有房子十余间,三家可以共住,便与乡下大房东商定承租此屋居住。”

从袁昌英之女、武大外文系学生杨静远的日记可看出,袁昌英一家从乐山城郊石乌龟搬进城里的愿望由来已久,但真正住进让庐的时间是1942年8月30日。自此,他们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武大复员,再也没有搬过家。

这里是三家人合住。苏雪林住东侧,外加楼上二、三间;袁昌英家住西侧,包括大客厅;楼上住着经济系韦从序教授一家。杨静远回忆说,房前有个大院子,“院子南端一道墙外,还有一个小院,一排平房,是三家的厨房、柴草间。我家的三